

# 风雨彩虹取“宝”路

## ——广西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综述(一)

□ 本报记者 唐龙

自治区民语委自2017年起开展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作,截至目前,已调查记录65个语言点,涵盖广西所有少数民族语言。其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值得品读。为给读者,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作的亲历者,感受他们讲述风雨彩虹般的取“宝”之路。

### 有“语”皆“宝”——百花齐放才是春

在讲故事之前,我们不得不讲一些必要的“题外话”。虽然语言是人类形影不离的“伴侣”,但人们认识到语言是一种宝贵文化资源的历史并不长。然而,随着人类对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人类对语言宝贵价值的共识也在不断凝聚。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语言不仅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和阐释者。语言保存着其语言社团对世界的特有认识,保存着其语言社团的历史记忆,包含着文化创新和语言发展的基本元素与内在驱动力。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毋庸置疑,任何语言都是宝贵的资源,可谓有“语”皆“宝”。语言作为一种宝贵资源,被人们(特别是“语保人”)亲切称为“语宝”。

正因为认识到语言是一种宝贵资源,所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一方面,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语言一旦消亡,以它为依托的思维方式、口传文化、民俗民风都将随之消失,而且永远无法恢复。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语言是人类宝贵文化财富。语言的多样性更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正可谓百花齐放才是春,故而保护语言,不仅是保护语言这一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在保护民族的、人类的文化资源,更是维护语言多样性,保护人类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

### 开展调查——躬耕“民语”广西行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大约有6000多种语言,据称到21世纪末将有90%的语言可能消亡,这就意味着语言所包蕴的人类文化财富,到21世纪末将要损失90%。中国的语言数目超过100种,且汉语的方言土语也数以百计。丰富的语言资源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失而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然而,据有关专家介绍,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传承、保持现状令人担忧,部分语种的保护工作收效甚微,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面临消失的危险。时不我待,抢救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一直以来,我国的语言政策坚持不仅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且还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基于对“语宝”的重要性和保护“语宝”的紧迫性的认识,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

根据2015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的《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鼓励各地在工程整体规划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筹措经费,落实保障条件,扩大调查点规模,

并纳入语保工程。”以及2016年5月由国家语委与国家民委办公厅共同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各地民语委、民语委可结合本地实际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在国家财政经费之外,争取地方经费、筹集社会资金,用于支持开展民语总体规划外调查点的工作,以及本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库的建设和语言资源集的编写,推进成果的开发应用”的精神,2017年,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8年行政职能并入自治区民宗委后,成立广西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继续推进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利用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的210万元经费开展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

截至目前,参与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语保人”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按照国家语保中心统一的工作和技术规范,在全区范围内调查、记录和整理了65个语言点600多万字、42万多条音视频的少数民族语言实录语料。

在已调查完成的65个语言点中涉及侗台语族45个点、苗瑶语族18个点、藏缅语族3个,包括58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和7个濒危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调查范围涵盖了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的方言及土语,基本实现广西所有少数民族语言全覆盖。

### 寻人发音——亦经风雨亦见彩虹

“做语保工程的语言点调查工作,寻找合适的发音人,也是一个寻宝的过程。”常年从事语言田野调查、一直参与语保工程的百色学院副院长吕嵩崧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一般要求高小文化以下,长期在本地生活,熟练掌握当地语言,能用普通话(或当地流行语言)沟通交流,年龄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五六十岁最合适。我们最喜欢找的,是年老一些的小学老师。”

据了解,语保工程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均以“科学”为标尺。一直参与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何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理想的发音人是项目质量的重要保证。语保工程对发音人的条件做了严格的规定。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人的要求,除了是男性、调查时年龄在55-65岁之间外,还要在当地出生和长大,家庭语言环境单纯(父母、配偶均是当地人)、未在外地长住、能说地道的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小学或者中学文化程度(一般不宜选择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和反应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且发音洪亮清晰。一般这4个条件缺一不可。”语保工程的语言点调查对发音人的要求可谓具体而明确。

为了寻找合适的发音人——特别是濒危语言的发音人,“语保人”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求助当地政府部门、通过亲戚牵线搭桥、寻求朋友介绍、通过师生关系推荐……即便如此,寻找发音人的过程也并非步步如意、事事顺风,大多历经坎坷艰辛,偶有惊喜,可谓亦经风雨亦见彩虹。

“在龙州点的时候,我们找了两个发音人。这两个发音人,说实话,都不是很情愿的。其中一个是我们一个老师的亲戚,他想推脱,但又碍于情面。另外一个不是亲戚,他当时在帮学校搞工程,可能是会得到6000



▲2019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项目隆林侬语课题组到隆林各族自治县岩茶乡湾桃屯寻找发音人。(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供图)

元钱吧。但是我们的劳务费给到个人,一般没有那么多的,当时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经费总共10万元,划归劳务费就没有那么多。为了那个6000元的活,他就不干发音人的活了。像这种问题,在每个课题组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吕嵩崧说。除了报酬“吸引力”不强,还有年龄上的担忧。“调查那坡彝语时,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发音合作人。但是这个发音合作人已经70多岁了,年龄偏大。因为调查过程挺折腾人的,所以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为他的身体状况提心吊胆。”真可谓:语保坎坷间,调查担风险。

但大多数情况下,知道来意后,很多群众都积极踊跃争当发音人。

“为了找到理想的发音人,一方面,我们团队得到当地民语部门或者当地的亲戚、朋友等的热心帮助。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通过面试从很多踊跃报名的志愿者中进行遴选。有时候我们到调查点挑选发音人,在跟发音人详细介绍我们的语言保护工作之后,他们都能以语保工程发音,能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乡音为荣,积极热情地加入我们的语保工作中来。”何霜说。

不缺风雨兼程,更有彩虹作伴。语保之路虽然坎坷艰辛,但也惊喜频频。“我们在调查壮语北部方言邕北土语的一个点的时候,来到当地后,一听说要寻找发音合作人,很多人踊跃报名,强烈要求当发音人。愿意合作的人很多,但最后我们只能选两个。”幸福的烦恼接踵而至,语保人当然顺势而为,吕嵩崧说,“后来定的其中一位发音合作人,完成了我们按规定完成的任务内容后。硬是要求我们多调查记录他的语言的其他内容。虽然超出任务范围,但是我们顺遂他的心愿,多录了很多内容。”

### 摄像录“宝”——千淘万漉始得金

据了解,语言保护既指维护语言的活力,也指语言的记录保存。所以语言保护,也包括保存,就是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把语言方言的实

际面貌记录下来,并进行长期有效地保存和展示。语言的记录保存,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整体保护工作的科学规划和具体调查记录整理加工技术手段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如果这些工作没做好,就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价值或作用,留下的遗憾、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与以往语言田野调查不同的是,语保工程的语言点调查工作程序更多,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规定更细。“一个语保课题从启动到完成,一般都要经过申请立项和组建课题组、专业培训和技能培训、发音人遴选、调查(纸笔记录与音像摄录)、材料整理与检查验收等几个重要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从2016年到2020年,一共负责了6个语保项目,对语保工程调查阶段的工作步骤如指掌的何霜告诉记者。

鉴于语保工程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特点,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严格按照国家语保工程技术规范和工作规范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并积极协调国家语言资源保护中心核心专家团队对广西各项目和调查团队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明确并统一质量要求。多年来,共开展8期培训,培训人员400余人,保障了语保工作的顺利实施。

语言点调查中的音像摄录对硬件设备、摄录环境的高标准,严要求,让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至今仍在参与语保工程、现于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卢奋长深有感触:“我们做语言调查中遇到的比较大的麻烦,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场地的的问题。以前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后来用的是摄录一体机。需要用到录音棚、语音室。设备上的、场地上的困难要比与人的交往的困难大得多。”

后才能动。这对于发音人的要求是很高的。一开始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这么要求、这么折腾发音人呢?后来我们看了那个录制的效果,就理解了。看了这样录出来的视频,就像是发音人正在跟你说话一样——它就要达到这种效果。如果发音人坐得斜一点或者矮一点,看起来就会不自然,所以相比于之前的田野调查,更艰苦的工作是在录音棚摄录。有些地方没有录音棚,我们还得在酒店里面用棉被等来隔音。因为它的要求比原来的田野调查要高得多。再比如它要求发音人发音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在录音棚里面热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动,但发音人不能动的。”多次开展语言田野调查的吕嵩崧对记者讲述了他的所闻所感。

据了解,进行音像摄录时,调查人员要克服寻找合适的场地、屏蔽噪音、天气闷热、身体不适等种种难题。“前期录制要避免后期重点筛查的飞机声、蝉鸣声、发音人咂嘴声、远处偶然一个高跟鞋声、拉椅子声……我们当时在都安一家隔音条件较差的宾馆里一遍遍地进行音像摄录,因为没有专门的录音棚,所以我们的摄录工作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当时正值暑假,天气燥热。在一个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为减轻基础噪音,我们不开空调,头顶又有几千瓦的一盏盏聚光灯。闷在这样的密室里摄录,让我们至今对发音人易以情同志充满了深深的歉意。”2017年,何霜带领团队调查都安地苏壮语,其间摄录的感人细节和深切感触让她终生难忘。“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们录制口头文化部分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其间不得不反复重录。仅仅一个故事的内容,就要从午后两点多一直摄录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其间发音人易以情同志拿了一条大毛巾不断擦掉一片片汗水,熬得眼睛里直冒血丝,他虽然几近崩溃,但又自己劝服自己坚持一遍遍重录,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当我们完成了全部的摄录环节时,整个团队的人直接瘫坐地上,已经没有力气欢呼了。”何霜说。